

《喇嘛王國的覆滅》評介

● 劉宇光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梅·戈爾斯坦著，杜永彬譯：
《喇嘛王國的覆滅》（北京：時事出版社，1994）。

本書是美國著名人類學及藏學專家戈爾斯坦的代表作，亦可以說是探討西藏現代史的權威著作，目

前似乎還沒有其他論著可以與之比肩^①。中譯本將原書副標題改作正標題，而英文本的書名原為《西藏現代史1913-1951》。精確言之，它是西藏在原政教合一政體下摸索現代化歷程的政治史。

本書的基本論旨是：以格魯派寺院集團為代表的宗教意識形態頑固派為了維護原有秩序，多次阻礙改革，西藏因而一再錯失現代化的寶貴時機，無法建立足夠生存實力，以致失去獨立機會，最終被中國佔領、併吞。

作者的觀點無疑是以西藏為本位，是從它作為一個雛形國家這一假定出發的。在這觀點的引導下，他以多層次的結構分析來論證前述主旨。首先，他從拉薩原政教合一政制的問題入手，討論拉薩各政教集團的權力結構以及拉薩與其他藏區關係這兩個課題。作為蒙古西藏世界的精神首都，能夠在拉薩政府中分沾政治權力的五個集團分別是達賴喇嘛、噶廈（議會）、貴族封建主、兩任達賴之間的攝政王、拉薩三大寺的喇嘛代表，後來再加上班禪喇嘛，由此形成權力上的合縱連橫。但是對西藏來說，拉薩並非中

《喇嘛王國的覆滅》是美國著名人類學及藏學專家戈爾斯坦的代表作，亦可以說是探討西藏現代史的權威著作，目前似乎還沒有其他論著可以與之比肩。它是西藏在原政教合一政體下摸索現代化歷程的政治史。

十九世紀末，西藏陷身英國、俄國及中國三方面的壓力中，不斷要在靠攏與疏遠之間找尋新的平衡點以求自保。作者企圖說明藏人的現代化改革是與追求民族獨立連為一體的。現代化失敗，亦導致獨立建國的失敗，而舊制度已僵化至連承受改革的能力都沒有。

央政府所在地的「首都」，因而拉薩政府與西藏各地之間並不存在中央與行省的關係。若說拉薩是西藏的首都，則只能說是宗教、文化、學術的精神首都，即「聖城」。但在政治方面，拉薩若仍稱為「中央」，則只是一沒有集權的弱勢中央。

跟着，作者舉出數點以說明拉薩政府與西藏各地之間的連繫。第一，拉薩政府並不能統籌或委派官員到地方任公職。第二，全藏稅項的收支是以封建主為中心而不是以拉薩為中心，所以拉薩無權對稅項所得的開支分配作統一籌劃。第三，在軍事方面，儘管以農牧為生的藏人表面上全民皆兵，但這只表示軍隊仍未專業化，因而欠缺全盤防衛部署，亦未建立高效率軍事制度。更重要的是，武裝力量並不隸屬於統一的指揮系統，而分別效命於各封建主和寺院。在本世紀上半葉，拉薩三大寺的武僧(dob-dob)總數已超過拉薩守軍總數一倍以上。此外，再加上宗教、歷史及地理背景因素，使西藏對整體國防問題甚為忽視。總的來說，拉薩政府在宗教背景的政制中，本來就存在達賴與攝政王為主軸的制度性周期惡鬥，而且拉薩對藏區地方並不具有直接而有效的實質管治，這些都直接影響其統治權的穩定性。

其次，十九世紀末西方向外擴張所引發的連鎖反應，使西藏陷於英國(透過印度)、俄國(透過布里雅特及卡爾梅克地區蒙古人)及中國三方面的壓力中，不斷要在靠攏與疏遠之間找尋新的平衡點以求自保。

然後，作者指出，這捉襟見肘的情境迫使當時拉薩最高統治者達賴十三世土登嘉措推動改革。但傳

統稅制使達賴根本欠缺改革所需的資金。當他嘗試在稅務上加強拉薩的中央集權角色時，又招致各地既得利益集團反對。由於達賴堅持改革，遂使潛伏在原先制度內的衝突表面化及激化。這不僅表現在拉薩與地方的關係上，也表現在拉薩內部各權力集團之間的衝突。為着對外鞏固國防，對內強化對各封建主的中央集權，達賴決意建立新式陸軍，讓軍人成為改革的新興勢力。這種種舉措，進一步擴大改革勢力與既得利益者之間的衝突。當達賴去世，改革者頓失靠山，舊秩序的守護者便全力反撲，改革派的文官被殺戮放逐，武官則被解職——對軍人稍為寬容是因為西藏的防衛危機已日漸嚴峻。

隨之而來的，是將本來由上而下的溫和改革轉變為建制外的激烈革命要求。於是，本來只是屬於技術層面的改革，演變為對社會制度整體的原則性改變。原改革派由於遭受守舊者打擊而對當時的秩序更感失望，遂把改革視野與層次推得更深更廣，從而引起傳統派更大的恐懼，令後者再次猛烈的遏止改革步伐，由此錯失了培養自保能力的時機，最終招致被併吞的命運。據作者的分析，抵制改革最力的，就是舊秩序中的觀念守護者：三大寺的喇嘛領袖。

作者企圖說明藏人的現代化改革是與追求民族獨立連為一體的。現代化失敗，亦導致獨立建國的失敗，而舊制度已僵化至連承受改革的能力都沒有。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本人儘管是人類學家，但他在書中幾乎避免正面提出任何社會科學理論作為詮釋框架，而更多是作史學家的工

作。由於他大量參考解封了的英、美、印度的軍事情報及外交秘密檔案，加上他本人精熟書面藏文及口頭藏語，不但可調閱拉薩政府檔案，更能直接用藏語向參與當代西藏多次政府劇變的西藏官員、貴族、軍人、喇嘛、武僧等近80人作長達3年的訪問，加上訪問錄音是先由作者用書面藏文整理記錄後才再譯為英語的，準確性因此大大提高；此外，作者甚至收集拉薩老百姓用以評諷時政局的口傳街頭歌謠，以輔討論。准此，就資料搜集的全面與周密來說，此書實屬不可多得的佳作。

然而，正由於作者迴避應用社會科學理論，尤其是有關「現代化」(modernization)及宗教社會學的理论，使得他無法對一些本屬傳統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共有的現象作出持平的價值判斷。舉例來說，他指責寺院集團固執於傳統觀念，這表面看來似不無根據。但問題是，不論是贊成、參與建制內溫和改革的政治領袖抑或是主張建制外革命的異議份子，他們也大多是來自寺院的僧侶。將整個僧侶集團等同於「頑固派」的判斷因而稍嫌過於簡化。據韋伯宗教社會學的觀點，傳統社會在面臨現代化的壓力下，其內部價值精英集團即宗教僧侶，會裂變成三股不同的力量：頑固保守者、激進改革者及退縮逃避者，當中的激進改革者往往在推動變革上扮演決定性角色。

這種情形亦非西藏獨有，即使在印度、錫蘭、泰國、越南、蒙古、緬甸等佛教國家，激進改革派僧侶在現代化過程中所擔當的決定性角色是眾所周知的。印支半島的國家還稱這類好將佛陀詮釋為社會

運動改革家的僧侶為「左翼僧侶」(engaged monk)②。即使在其他亞洲國家，儘管這種佛教僧侶的數量及影響力低於佛教國家，但還是有類似形況，例如清末民初到1949年止的中國，80年代後期的台灣、韓國及日本等。因此，儘管寺院集團中的確存在着保守頑固派，但他們同樣見於噶廈及地方貴族中，而改良派或革命派亦多的是寺院出身的僧人，故將寺院視為現代化的障礙恐怕同時有定義過寬及過窄的缺點。畢竟，寺院或僧侶的社會角色不能被化約為只具單一的性質。僧侶集團內部不是一致的。

其次，1904年英軍入侵拉薩後，現代西藏才首次遇上西方的威脅。要一個在經濟、政治結構還處於封建階段的社會在短短50年內成為一個現代社會，恐怕是不切實際的，因此要找一個單線的因果關係來為西藏現代化的失敗「負責」，實有簡化問題之嫌。單就軍事上來說，即使西藏能完成現代建軍，但由於中國與西藏力量懸殊，雙方一旦爆發軍事衝突，西藏是不可能以其單薄的力量持久抗衡的。

此外，作者只在史料解釋中稍為涉及，卻沒有充分發揮的另一個問題是，由元代到民國將近千年，中國政府與西藏政府在名義上一直維持着宗主國與藩屬的關係。然而實質上歷代中國各朝政府並不直接干涉西藏內政，而且亦滿足於這種限於形式的主屬關係。只要西藏從地理上隔開中亞，使中國免受西部直接的國防壓力，中國其實並無興趣管治地廣人稀的「化外蠻夷之地」。但隨着西方文明(英、俄)勢力進入西藏，中國在強烈的危機意識驅策下，自然不再滿足於傳統的中藏

作者指責寺院集團固執於傳統觀念，這表面看來似不無根據。但問題是，不論是贊成、參與建制內溫和改革的政治領袖抑或是主張建制外革命的異議份子，他們也大多是來自寺院的僧侶。將整個僧侶集團等同於「頑固派」的判斷因而稍嫌過於簡化。

在很大程度上，本書能破除將西藏視為「蠻夷」或人間天國的神話，並能充分顯示西藏被迫在保存傳統價值與掙扎求存間擺蕩，從而經歷保守、改良、革命、復辟反撲等階段。

關係。另一方面，西藏由於缺乏足夠力量與中國協商和發展雙方能接納的新中藏關係，結果導致中國用軍事強行進入的方式掌控西藏。西方列強突然而猛烈地施壓於中藏兩方時，一方面使得原有的關係模式失效，另一方面亦因時間上的急迫而未能使雙方調協新的交往模式。在雙方關係還陷於膠着的狀態時，中國即運用現代「國家」觀念強行將雙方關係再次納入由中國主導的局面。此時，中國對西藏的統治早已不再是以前那種名為宗主責任由之半獨立的象徵式統治。當然，中國政府以現代「國家」觀念去解釋西藏「自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在概念的運用上存在着簡化與跳躍的滑轉。畢竟，「帝國」(empire)與現代意義的「國家」(state)是兩個相去甚遠的觀念，不應混為一談。

作者的基本看法是，西藏有可能成為另一個政治實體，這也表達了一部分西藏人的政治立場。此外，亦可從書中看到，西藏人如何理解中國人，這往往與官方說法相反。最典型的例子是，中藏兩國對國府代表吳忠信入藏參觀十四世達賴坐牀典禮的身分角色，有着完全相反的理解。對在傳統儒教文化下成長的中國人或華人讀者，「西藏」二字往往是落後、怪力亂神、迷信的同義詞，但這種印象只反映了正統觀念所塑造及投射的偏見，以及偏狹的文化歧視。自清季以來，以天朝自居的中國人被西方列強打敗後，往往需要塑造比自己更不堪的對象來重拾自尊，而對西藏的態度也許正是這種自卑與自大情結的反映。當然，也有不少教徒從不同的方向對西藏作出不切事實的遐想——將西藏視為聖域。

在很大程度上，本書能破除上述兩種將西藏視為「蠻夷」或人間天國的神話，並能充分顯示，一如其他在西方槍口下追求現代化以自保的社會，西藏被迫在保存傳統價值與掙扎求存間擺蕩，從而經歷保守、改良、革命、復辟反撲等階段。在內外交迫的危急情況下，經過日益激烈的權力惡鬥後仍然透顯了對現代化路線的爭論，當中的摸索有成功也有失敗。但總的而言，西藏人的奮鬥並不見得和中國有很大差別。就摸索「現代化」的經驗上，中國人會在本書中發現西藏的歷程，包括自主獨立的追求、技術及經濟的開發、社會及政治秩序的合理重組等等，其實都並不陌生。儘管當中有失敗與障礙，但那何嘗不是中國仍在解決的難題？

然而，作者的觀點似乎也隱存着自我矛盾，因為在「西藏是否具有政治獨立性」這個問題上，作者頗同情藏人的政治訴求，但在文化上，他卻認為現代文明才是西藏的生存之道。作者這種持論固然考慮到西藏面臨軍事侵略的實際問題，但另一方面恐怕亦免不了有將「現代化」等同「西方化」的混淆。畢竟在槍口威脅下的現代化是必要的，但「現代化」並不就是「西化」。作者這種帶有好壞二分的簡化觀點，有時會使他的分析欠周全。其中一個重要例子便是在他批評政教合一體制左右着現代化的同時，卻忽略了十三、十四兩任達賴正因為這制度所授予的宗教絕對權威，才得以克服包括部分宗教集團在內的頑固派對政治或其他領域現代化的強硬抵制。誠然，這種制度有否必要繼續下去的確是一個疑問，就連現任達賴亦坦言它不過是一歷史產物，並

已公開聲明拒絕再「輪迴」下去。但無論如何，在現代化的歷程中，十三、十四兩任達賴卻得借助這種制度來推行改革。

諷刺的是，作者在態度上的兩面性，使得他為藏人的政治觀點作辯的同時，卻又間接為中國統治西藏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利的論據。因此，中國藏學界才願意冒險讓作者同情藏人的論點以中文面世。畢竟，對中國官方來說，借助作者的論據所帶來的明顯好處，顯然多於作者政治立場可能造成的潛在損害。不過，中國藏學界願意翻譯這部在根本政治立場上與中國官方明顯不同的著作，可能亦反映他們願意多聽取不同聲音，似乎顯示了願意正視西藏問題的多層面性，這自然是一種進步。

總的而言，此書值得向中國現代史、藏學、宗教社會學、「現代化」的政治和社會學、格魯派哲學等多個學術領域的研究者，乃至西藏現狀的關懷者及不願只迷溺於教條的佛教徒大力推薦。假若本書之中譯本能有助漢藏二族之相互理解，則更值得肯定了。

譯者杜永彬先生是一位通藏文的藏學研究者，有能力就原作者所動用的藏文檔案進行原文核實，這就增強了中譯本的學術準確性及專業性。不過，書中藏文術語的中譯仍有一值得商榷之處：中譯本頁36中間，有藏文 $mtshan\ nyid$ ，原作者將之譯作 $logic$ （英文原版頁34），而杜先生依此譯為「邏輯學」。但不論是英譯或中譯恐怕都是誤譯，因該詞是梵文 $lakṣaṇa$ 的藏譯，古代中國學者譯為「性相」、「法相」，其實它就是指與原書同段下一句「密教」一詞相對的「顯教」。精確來說，它專

指一切有部、經量部、唯識學及中觀學的四部「宗義」($grub\ mtha$)，意即佛教哲學，在典籍上，它專指「五部大論」，即《世親俱舍論》、《法稱釋量論》、《月稱入中論》等。至於英譯或中譯所誤用的 $logic$ 或「邏輯學」，藏文相應的詞語是「理路」($rig\ lam$)，廣義上指「集類學」($bsdus\ grwa$)，即包括「因類學」(邏輯學 $rtags\ rigs$)、「心類學」(外感官知覺理論及情緒分類論 $blo\ rigs$)及「攝類學」(範疇論)的綜合性學科；狹義上則指三項當中的「因類學」，即單純的「因明」($gtan\ tshig$ ，由梵文 $hetu-vidyā$ 所譯)。「集類學」屬西藏「學問寺」($monastic\ university$)教育體制中一到四級，「顯教」屬五到十三級，前者是基本課，後者是中、高級課。這些術語皆有嚴格定義，不能混淆。

在「西藏是否具政治獨立性」這個問題上，作者頗同情藏人的政治訴求，但在文化上，他卻認為現代文明才是西藏的生存之道。作者這種持論固然考慮到西藏面臨着軍事侵略的實際問題，但另一方面恐怕亦免不了有將「現代化」等同「西方化」的混淆。

註釋

① 筆者在完成本文後，才知道1996年12月出版了一本厚達733頁的巨著，作者是Warren W. Smith，書名為*Tibetan Nation: A History of Tibetan Nationalism and Sino-Tibetan Relation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6)。

② 有關亞洲各佛教國家的「左翼僧侶」之抗爭活動，可參見C. Queen, S. King, *Engaged Buddhism: Buddhist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Asia* (New York: SUNY, 1996); F. Eppsteiner, *The Path of Compassion: Writing on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 (California: Parallax Press, 1988)。